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办公室

罗光泽 回忆录

归档时的案卷号：

自1982年 8月 日起至1984年 5月 日止

卷内共 2份 258张

保管期限

卷 內 目 录

[illegible]

罗 光 泽 同 志 回 忆 录

(原名罗大泽)

栋宇 韩冬 整理

一九八二年八月

目 录

一、受尽人间苦，走上革命路·····	1
二、筑工事，守阵地·····	7
三、固守草庙梁·····	9
四、攻打黑包山·····	11
五、我印象中的陈政委·····	12
六、行军路上·····	16
七、攻打汉中·····	19
八、横渡嘉陵江·····	22
九、剑门关上杀敌人·····	27
十、过雪山·····	33
十一、草地生活片断·····	41
十二、两次巧遇·····	49
十三、全国人民心向延安·····	53
十四、自己动手，战胜困难·····	57
十五、抗大迁往敌后·····	60
十六、迁校太行·····	65
十七、在地方工作团·····	68
十八、由延安到沈阳·····	73

吉林省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交换)

一、 受尽人间苦,走上革命路

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乌云翻滚,鬼蜮横行。处在人间最底层的穷苦农民,在地主豪绅的压榨下,在军阀土匪的抢掠下,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

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由于封建官僚盘根错节,各派军阀角逐争雄,却成了凄凄惨惨的人间地狱。

那时候,地方上的封建政权衙门林立,恶似虎狼,区有保长、村有甲长、组有排首,构成一套盘剥人民的反动机器。一方面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什么“完粮”,什么“捐款”,这费那费,不一而足;一方面军阀混战,更要拉夫抽丁,征粮派款,大小军阀往复抢掠,区保甲排,层层加码,巧取豪夺,真是“交不完的粮,捐不尽的款,纳不清的税”,农民们简直被榨干了骨髓!当时流传的谣谚“农民头上三把刀:地租、捐税、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饭、坐监牢”,就是四川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家住在四川的一个半山区,嘉陵江畔的阆中县。祖祖辈辈生活在达摩垭罗家咀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几辈人辛勤劳作,打下的粮食还填不满地主催租索命的“斗”,一家人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苦度春秋。

我六、七岁上就和穷伙伴一起给地主放牛,打短工,受尽了欺凌。十三、四岁时,父亲因劳累和疾病的折磨死去了,为了抵偿父亲生前欠下的债务,哥哥罗大早含泪离别亲人给地主当了长工,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才勉强能够顶上欠债的利息。这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就落到了母亲一人身上。为了减轻一点家庭负担,我跟人家学会了熬糖和做“火烧馍”、“杠头”的手艺,农闲时候,就背起篮子到街场上去叫卖,赚几个铜板买油盐,还可以赚些糖渣、麦麸子填肚子。

现在,一提起什么叫“无产阶级和贫雇农”,我就自然会记起自己十几岁时,无论冬夏,总是穿着一件勉强遮体的破长衫,赤着两只

脚，被寒风吹裂了口子流着血染红了草鞋的情景。

生活的困窘并不等于知识一定贫乏，劳动人家的孩子求知欲望大得很呢！

虽然家里交不起学费，但由于我好学心强，刻苦坚持，竟断断续续地“读”了三个半年书——那是怎样的读书啊！学堂里，有钱人家的孩子正在琅琅诵读，我就隔着窗子一句一句地跟着念；十冬腊月天，北风刺骨寒，我不停地哈着手，跺着脚，一段一段地背诵；盛夏酷暑，我一边割草，一边想着书上的故事，常常出了神割破了手指，鲜血直淌……就这样，我背会了《三字经》、《百家姓》，读完了《大学》、《中庸》和《论语》。

后来，妈妈看我还聪明，又学会了几个字，便托人送我到镇子的中药店学徒，拜师汪朝玉先生。我白天抓药，照看柜台，晚上就读读药书，背背“汤头”，还学会了打算盘和记账，这给我参加革命后的写写算算，打下了一个基础。

日复日，年复年，哥哥拚死拚活地扛活，却没有丝毫改变家庭的窘况，连家园里祖辈传留下来的几棵大树都砍光了，也没有还清欠下地主的闰王债。到我二十岁的时候，欠债竟有一百一十串（钱）之多！

有一年年景不好，开始时，我家还用些野菜、糠皮、麻根等充饥，后来，连山上的树皮都剥光了，全家人和乡亲们就用“神仙面”（观音土）填肚子。村里饿死的人都顾不上埋啊！我家旧账没还完，又欠下了不少新账。

转过年，到了一九三二年的二、三月，一天，我正在家里收拾农具，妈妈去串亲未归，忽然从外面闯进来两个地主的狗腿子，不由分说就用铁链子把我拴上了，然后推推搡搡地把我带到了双河场集市上的陈家茶馆门口，锁在一根大木柱上，晒在烈日下，而那两个村丁却到屋里喝茶去了。那时候，陈家茶馆在我们家乡双河场“新场”，是颇有名气的。保长、甲长和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象哥老会的大哥、二哥等都在那里喝茶，乡村里有个大事小情，也都在这个茶馆里讲道理解决矛盾。

当天下午，母亲得知我被绑到镇子上，便拄着棍子跌跌撞撞哭喊着跑来了：“谁呀，谁把我儿子绑去了！我还指望我儿子吃饭呢！”

幸好村丁中有一个是母亲的本家侄子，拗不过母亲的哭骂，在众人的说和下，就势找了个台阶：“好吧，谁当个保人？”

“取保放人可以，不过得交开锁钱。不交我们吃什么？”另一个村丁悻悻地吆喝着。

保人好找，可这“开锁钱”到哪去筹借呢！无奈，母亲只好狠下心来，去借镇子上专放高利贷的陈泡毛的“刀口钱”。借这个钱可不是好玩的，一是利钱高，二是借期短。一场（集）三天，一块钱（银元）就得还一块三，三场九天就是两块钱！何况放高利贷者多是当地的恶霸、地痞，借了钱到时候不还，那是不得了的，所以人们称借用这个钱叫“刀口钱”。听说母亲借了“刀口钱”为我开锁，我的心不禁怦怦地跳了起来，这不是今天开了锁，明天大祸临头吗？我暗暗打定了主意。开了锁，我“噗通”“噗通”给保人和母亲磕了两个响头，便头也不回地跑开了。我要找个地方做事去，一来躲避这场灾祸，二来挣几个钱，快还这笔闰王债，不能眼睁睁地让母亲受屈辱，为生活受煎熬。当地有句谚语：“要得本钱轻，除非玩乌金（背煤炭）”这也是破产农民的一条生路。我一口气跑出了一百多里路，来到了表哥苟建选背煤炭的地方——旺苍县黄桷场（现在的广旺矿区）。

我拿出了藏在腰带里的仅有的几个铜钱——这点救命的“本钱”，在表哥的接济下，开始了背炭工的痛苦生涯。

没经过那非人的生活，怎么能想象得出挖炭工和背炭工的辛酸遭遇啊！

煤洞开在山顶上，地岔沟里，巷道低矮狭窄，潮湿闷热。恶劣的生产环境，原始的采煤方法，使当时的挖炭工真如^生活在地狱里一般。他们只用一块破布遮着下身，几乎是打着赤条，头上拴着一盏小桐油灯，除了眼睛和牙齿是白的，遍体煤尘，连鼻孔都被油烟熏黑了。他们有时终日泡在齐腰深的污水中作业，有时半跪着、仰卧着、扭曲着身躯，用手镐一镐一镐地刨着、刨着……他们还得把挖下的煤块装在拖筐里，放在木制的爬犁架上，然后两肘拄地，一步一步地爬行，把它拖到地面上来。“乌金”，多么好听的字眼啊！然而，它是多少挖炭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窑黑子”在最黑暗的地下，用手抠出来，又以肘代步，一步一个血印地拖运出来的，它是多少条廉价的生命换来的啊！

背炭工的生活又怎么样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个高大的架子，有两条腿，上下四道梁，中间两道编着竹蔑子，上边的横梁上系驮煤炭用，下边的横档作休息时打杵用。每人有个丁字杵子，杵子上面凿一道槽，在休息时，把背架的下梁支在杵子上的槽内，增加一条腿以保持平衡，借以歇歇劲，喘口气。我们花几个铜板，在窑主那里买下几块炭，放在背架上捆好，就开始艰苦的长途背运了。

由于山高路远坡陡，而且多是长满青苔的石头路，一个人轻手利脚地走一趟都很困难，我们负重的背炭工就更不容易了。为了防止滑倒，我们在草鞋下面套上一个“铁脚码子”，这是一块椭圆形的扁铁圈，下面钉有四个向下的铁钉，抓向地面，增加摩擦力，也有的用草绳绑在草鞋底上，叫“草脚码子”。

从山顶到山脚，曲曲弯弯的小路，足有三、五十里，其中有五、六里地是在万丈悬崖上。这一段路可真是背炭工的“鬼门关”，有多少穷伙伴不慎失足，连人带煤跌下峭壁，连尸首都找不到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山下，喘口气还得背起这一百多斤重的煤炭到二百多里的地方去卖。这一趟路，连来带去得十多天，为了省钱，我们每个人都随身背着苞米楂子、小豆，住宿时买点盐巴，租口锅煮粥度命。就这样，我苦撑苦挨背到年末，总算攒了几块白洋。这中间，我溜回家一次，看了母亲，把钱留给家里了。在背煤的过程中，我们认识了几个背碗卖的穷弟兄，第二年春天，我和表哥就不再背煤炭了，跟着他们从木门一带山里边的碗窑上，背碗到几百里之外去卖。这时鸦片已经成熟，种植鸦片的烟农急需瓷碗割装烟浆，不惜金钱大量收买，跑一趟能赚一块白洋，这可真是从没见过的好活计。干这个活，人身的危险减少了，但瓷碗跌碎的危险却增大了。有一天雨后，我走在一段下坡的黄泥路上，不慎脚下一滑，身不由己地摔倒下去。我心里着急，担心瓷碗被摔坏，丢了命根子，便急忙伸出左手去支撑地面，保护瓷碗别被砸碎，结果，保住了瓷碗，我左腕的骨头却被挫断了，直到现在，还留有残疾。

这时，议论红军打过来的风声多了，乡里乡外纷纷传说着“青面红发、巨齿獠牙，一天吃两娃娃”的诬蔑红军的谣言。人们谈虎色变地传播着，半信半疑地听着，耕田的没心下地，做买卖的也无意招揽生意。天阴霾着脸，人们的心头也笼罩着愁云……

一九三三年的五月，红军在空山坝一仗，以排山倒海之势把田颂尧等军阀打得个落花流水，国民党军队从前线溃败下来，有如决堤洪水，争先恐后地逃命。真是“兵败如山倒”，这些往日耀武扬威的家伙，个个象没头的苍蝇，大路上跑不开，就从稻田地里没命地逃窜。我们一起背碗的几个伙伴，躲在大树上的叶梢间看着田野上的溃兵和夹杂着的乡绅一起奔逃，不由地惊叹：“连那些兵都怕，这红军可真是够厉害的了！”

在树上呆的时间长了，肚子饿得受不住了，我们想到村子里去找点东西吃，便都小心翼翼地下了树，悄悄地打听关于红军的消息。那些没跑的穷苦老乡都竖起大拇指异口同声地说：“可好啦，他们都是穷人兵，为穷人打仗的”。还有的老乡告诉我们：“明天还要开会，开仓分粮呢！”我们再看看大街上，虽然冷清了些，但却井然有序，心里也有了底，觉得红军确实是一支为穷人的队伍。

看着这兵荒马乱的情况，再也不能背碗卖了，我就回到了家乡。红军还未来到，地主老财都跑光了。我们在外面闯荡的几个小伙子，这回可成了山沟里的大秀才了，人们拥前围后地问我们：“看见红军了？红军是啥个样子？”我虽然说不清楚，但也凭着自己听到看到的情况，认真地宣传起来，说明红军的主张是打富济贫，咱们穷人不要害怕。

一天，我和近邻的黎士章、王忠友、罗思达、罗思宣、黎开光等十几个小伙子到山里去干活，远远看到山沟里的山洞前有人影晃动，我们好奇地绕到附近，看见洞前放有滑杆，拴有马匹，还有小姐太太出出进进。“这准是远处来的逃亡地主。”我们正猜测着、议论着，不知谁喊了一声：“打他个狗财主！”早就恨透了地主老财的小伙子们一声呐喊，冲了上去，七手八脚把狗地主捆了起来，小姐太太也都吓得浑身打战，跪下求饶。我们没收了他们的财物，把他们的腊肉煮着吃了，把一些银元、大烟土和其它浮财放到达摩垭的庙堂里，派人看守着。

我们越干胆子越大，在本地方的村子里也动起手来，没收了地主的财产。这样一来，财物渐多，大家不知怎么处置好，万一地主回来又怎么办？我说：“咱们找红军问问吧！”大家你推我，我推你，都不敢出这个头。后来想到了我的一个远房叔叔，名叫罗养泉，他是山

村里的穷秀才，讲古论今，评断是非，是个出名的“说客”。我们十几个人簇拥着他到了离家四十里的龙山镇区苏维埃。那时候，穷人找红军告状的、诉苦的、打劫了地主财物去问怎么办的，络绎不绝。接待罗养泉的是红军的一位征粮干事，叔叔和他谈好之后，他让我们进去。我们又怕又喜，怕的是见了生人不知说些啥，喜的是这回可见到红军了。他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同志，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军装，腰束皮带，斜插着手枪，头戴八角帽，帽上的红星闪闪发光，可有气魄啦！他客客气气地为我们让座送茶，他说他也是帮长工出身的穷苦人，穷人要找出路就得组织起来闹革命。他还说，部队很快就要打过来，你们回去要建立村苏维埃政权，地主就不敢欺侮你们了。我们听得心里热乎乎的。

我们达摩垭村苏维埃很快组织起来了，我的叔伯哥哥罗大信当了村苏维埃主席，劳工委员是杨建举，内务委员罗大全，游击队长由当过兵的冯延华担任，还有土地委员等，我是游击队的组长。我们游击队的任务是“打粮”，没收地主豪绅财物，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有几次地主武装前来报复，妄图夺回他们被分掉的财物，都被我们打跑了。这样一来，更加大长了贫苦人家的志气，大灭了地主老财的威风。

那年七、八月份，红军打下了绥庭府达县城，并很快占领了川东北十几个县，红色苏维埃迅速扩大，需要扩充兵员，我们村的游击队改为赤卫军，后来到香炉山乡苏维埃，整编成独立团，我被推选为二营六连连长。

我们独立团，由一位老红军来当团长，连以下干部都是地方游击队提拔的。参加革命，要为普天下的穷苦人谋解放，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坚决的，队伍要离开家乡开赴前线，有的不想干，找理由要求回家，也有少数不辞而别，开了小差。记得当时为了说服大家，我举了这么个例子：我们干革命，就好比往上坡推石头，谁也不能松手，否则大家都会被石头砸死。为了求解放做主人，我们要齐心合力，把革命干到底。我们连八十六人终于随独立团开往绥定府，集体参加了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正式开始了红军战士生活。

二、筑工事，守阵地

一九三三年初，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移到川北一带，在当地党组织、人民群众、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迅速发展到十几个县、六百多万人口。因此需要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也要休整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同时也须集中兵力，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进一步打击和消灭敌人，于是我们采取了收缩阵地的战略措施。在收缩阵地的战线上，构筑多种多样坚固的工事来防御敌人。这时在新的战线上，做工事成了红军头等重要的任务。

我一参军就在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当打旗兵，做工事是我参军后对我第一次严峻的考验。由于敌人随时都有进犯的可能，所以上级布置做工事的命令，是非常严肃的，坚定不移的，必须按时完成。任务由各单位分片包干。我们团部由于团首长、事务人员等有许多工作要做，因此他们参加修工事的时间很少；加上交通队有老有少和体弱多病的，所以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得一个人完成几个人的任务。我们从老百姓家借来工具，昼夜奋战，唯恐落到其他单位的后面。我们一个人一天要挖好多立方米的土方，手上打起了血泡，疼得直咧咀，但仍然挺着干。抬大筐是最累的活了，一筐土石足有二、三百斤，把肩膀都压得通红，肿得高高的，但谁也不肯休息一会儿，更不愿把自己的任务推给别人。有一天，陈锡联政委谈笑风声地来到我们的工地，他用手拍了拍正在挖土的外号叫“黄陂佬”的传令兵，对大家说：“同志们累了吧？”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累！”“不累？”陈政委不相信地摇了摇头，笑着说：“‘婆娘’，把手伸出来我看看。”“看什么？”外号叫“婆娘”的传令兵奇怪地问。“看看有几门大炮呀！”

这时我们才理解到政委所说的大炮，是指手上打了多少血泡，“婆娘”躲闪着不让政委看。政委又风趣地说：“怎么，有大炮还不

拿出来打军阀刘湘，你是不是想保护刘湘呀！”

政委的话逗得大家哈哈直乐，工地也更加活跃起来。调皮的夸子说：“刘湘是他儿子，他能不保护吗！”小蛮子也抢着说：“不对，他是刘湘的小婆娘，对刘湘爱的可热乎了！”

大家乐得前仰后合，叫“婆娘”的传令兵脸红了，一直红到耳朵根，上去扯小蛮子就打，口里嚷着：“我是不是得找根针把你这咀给缝上！”阵锡联同志从“婆娘”的手中夺下铁锹，欢快地说道：“你找针去，我替你挖一会儿。”说着便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

由于大家明白“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从不喊苦叫累，甚至带病坚持劳动。就这样，很短的时间就把阵地上的大小山包几乎挖空了。工事遍布，绵延不绝，伸展出去好远好远。

工事要求坚固适用。根据敌情、地形和我们的装备来确定工事的规格和种类。重机枪、轻机枪、迫击炮、步兵掩体等工事都有不同的要求。机枪和炮的工事要用木头柴草盖上，再填上很厚的一层土，使敌人炮弹炸不透。在工事与工事之间挖有联络壕，既可做交通沟，又可做步兵掩体。工事前面的一段地带上，树木杂草全都砍光，以便于观察敌情，杀伤敌人。用砍下来的树木，在工事前四、五十米的地方堆成一堵墙，阻碍敌人进攻的道路，这叫做木城。木城上有时系有铁铃，一碰就响，用来传送敌情。有的战士发挥聪明才智，在估计敌人可能密集进攻的那段木城上，隔一段距离系上一颗炸弹，用绳子连上导火索，将绳子的一头拉入工事，编上号码。待密集的敌人接近炸弹时，按绳子的编号，用力一拉，炸弹轰然爆炸，将敌人炸得血肉横飞。在交通要道上，挖有陷井，插上竹签，上面用树枝杂草伪装好，免得敌人发现。

工事做完不久，有一天清晨，天刚麻麻亮，一股敌人突然向我们发起进攻。炮弹一个个地落在我们的阵地上，震得盖沟上的土直掉渣。敌人的机枪步枪同时向我们疯狂扫射。指挥员严肃地命令：各部队投入战斗！我们隐蔽在工事里，手握纲枪、手榴弹，怒睁双目，严阵以待，全神贯注地监视敌人。当敌人进攻接近木城时，只听指挥员一声“打！”我们的机枪、步枪、手榴弹、小炮一起开火。前面的敌人纷纷倒下，后面的敌人又蜂拥而上，又被我们愤怒的枪弹打退下去。但敌人不甘心失败，经过重新部署，又反扑过来。越过木城，接近我们的工事时，指挥员命令：“准备冲锋！”只听上刺刀的“咔”“咔”

声。一排手榴弹甩出去，在敌群中爆炸了，形成一堵烟墙。乘此机会，指挥员大喊一声：“冲啊！”战士们有的端着刺刀，有的高举明晃晃的大刀，跃出工事，趁着烟雾向惊魂未定的敌群猛扑过去。进行白刃拚搏。只看见刀光剑影，寒光闪闪，血肉横飞；只听得刀枪相碰的叮咣声、用力拚杀的嘿、嘿声。经过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大部敌人被歼；企图越过木城逃跑的敌人当场被俘；仓惶逃命的敌人有的掉入陷阱，被早已安设的竹签扎得鲜血淋漓。耀武扬威的匪军成了我们的瓮中鳖。

来势凶凶的敌人大有一口吞没我们阵地之势，哪料到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埋葬他们的坟墓。这次战斗他们带回去的不是什么战利品，而是伤兵和死亡者的名单。

三、固守草庙梁

草庙梁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山村，是我军收缩阵地战线上许多重要支点之一。它丘陵起伏，重峦迭障。山上有苍松翠柏、青竹杂草；山谷溪水淙淙，常年不竭。稀疏的农舍座落在山坡上。虽属严冬，但松柏迎风斗寒，仍披着绿色的盛装，经霜的阔叶树，叶子有黄有红，漫山遍野红绿相间，把草庙梁衬托得更加雄伟壮观。红军战士在山坡上挖壕盖沟，构筑工事，准备痛歼来犯的敌人。当地翻身的农民积极地支援我们，自动送粮送菜，帮助红军修筑工事，站岗放哨，传递情报。草庙梁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加上军民同心协力，众志成城，因而这块阵地坚如盘石，稳如泰山，任何敌人企图进犯都不能得逞。

一九三三年冬，刘湘匪军向我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固守的阵地草庙梁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战斗是在下午打响的。团政治委员陈锡联同志、团部交通队的同志和三营全体指战员一起参加了保卫草庙梁的战斗。

敌人开始用小股部队不断对我阵地进行袭击，胡乱打枪，探听我们的虚实。我们进入工事，做好战斗准备，严密监视敌人，但未还击。到黄昏时，一股敌人蜂拥而来，一边前进，一边鼓噪。待敌人进攻到我火力有效射程内时，三营营长一声命令：打！各种武器一齐开

火，密集如雨的枪弹给敌人以极大的杀伤，扔下不少尸体，残敌抱头鼠窜，败退下去。夜幕降临了，但不时还有枪声。红军战士仍握钢枪，坚守在阵地上。天放亮时，枪声又密集起来，敌人开始了第二次进攻，又被我们英勇的红军战士击溃。太阳升到两杆子来高了，敌人又纠集大部队用密集的队形再一次向我们阵地猛烈进攻。敌人张牙舞爪，气势汹汹，向我阵地猛扑过来。当时我们只有一个营和一个团部的兵力，形势非常紧急。全体指战员临危不惧，镇静自若，下定决心，与阵地共存亡。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陈锡联政委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命令团部交通队等凡是能够拿起武器的人都拿起武器投入战斗；二是为了从精神上震慑敌人，鼓舞我军士气，团首长命令全团打旗兵，把红旗插到阵地前沿去。我当时是团部的打旗兵，团首长话音一落，我首先挺身而出扛起大旗，一股劲地跑上前去。子弹在我前后左右嗖嗖直响，但这些我全顾不上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把大旗插到前沿阵地上去。我跑上山冈，迅速把旗帜插稳，急忙卧倒，手把旗杆，让它牢牢地立在山头之上。接着各单位的旗帜也一个一个地都插上山冈，远看红彤彤的一大趟，煞是威风！当红军战士看到鲜艳的红旗凌空飘展的雄姿时，浑身增添了力量，精神大振，信心倍增。三营长不断发出命令：“要顶住！狠狠地打！坚持就是胜利！”我们的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愤怒的子弹向敌人倾泻过去，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敌人动摇了，企图掉头溃逃。这时三营长把驳壳枪一挥，大声命令：同志们，冲啊！他身先士卒带领战士们象猛虎一样跃出工事，象开了闸门的洪水，扑向敌阵，进行白刃搏斗。只听到枪声喊杀声响彻山谷，直冲云霄。杀得敌人尸骸遍地。幸存的残敌扔下枪支弹药，只顾一个劲地逃命。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我们打退了数倍于我们的敌人，取得了伟大胜利。那随风飘动的红旗，哗华作响，仿佛向红军战士倾吐胜利的喜悦。

经过战斗洗礼的草庙梁显得更加威武雄壮了。

四、攻打黑包山

一九三四年春，四川军阀刘湘的嫡系郝耀庭旅及另两个附属团，盘踞在我苏区东南边的黑包山上。他们在群山中构筑工事，建设城堡，准备歇兵过旧历年。

我军指挥部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战机，决定吃掉这股敌人，全歼郝耀庭匪军，给刘湘和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

此地一带群山起伏，草丰树茂，郁郁葱葱，黑森森一片，故此当地老百姓称此山为“黑包山”。郝匪盘踞的山梁，东面坡度较缓，工事遍布，重兵布防，白天攻打，必定造成大量伤亡；西面悬崖峭壁，敌人以为是天然屏障，设防不严。指挥部决定从东面夜袭，插入敌人心脏。这个任务交给了全军有名的“夜老虎”——八十八师二六五团。该团立即进行准备，经过周密的组织部署，趁敌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漆黑夜晚从东面山坡摸进去，插入敌阵，配合外围友邻部队，消灭敌人。

其余各部队都按指挥部的部署，各就各位，等待命令。整个战场除了微风拂动树叶沙沙作响外，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家屏住呼吸，焦急地等待着二六五团摸上去的消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心情也越来越加紧张，几乎都能听到自己心脏怦怦的跳动声。二六五团预计摸上去的时间快到了，大家把眼睛瞪得滴溜圆，注视着黑包山的方向，希望马上见到信号，听到枪声。但一切还是那么寂静。

“怎么回事呢？难道出问题了吗？”有的战士不安地嘀咕起来。

“刘湘这兔崽子，抓住他一定千刀万剐，凌迟处死，让他活受罪。”有的战士愤愤地骂了起来。

这时，忽然听到陈政委命令交通队集合，我们立即站好队。陈锡联同志站在我们面前下达任务。他讲话的声音不高，但却斩钉截铁，刚毅有力。他说，由于刘匪布防严密，道路复杂，二六五团没能按时摸上去，影响了全军的计划部署。现在指挥部把偷袭黑包山的任务交给我们团。现在我命令：“你们交通队去完成！大家要彻底轻装，只

带短枪、手榴弹、大刀，千方百计一定要从西面的峭壁上登上去，上不去，你们就不要回来！现在马上准备！”交通队的同志听到这个命令后，非常激动，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出了许多办法，确定了登上峭壁的具体方案和措施。任务明确后，大家分头找工具，有的砍竹杆，有的找绳子，很快就把竹杆和绳子准备足了。我们分成三组，迅速把碗口粗的竹杆一根根地接在一起把它绑牢，有好几十米长，一共绑了三根。然后把接起的竹杆往峭壁上一立，由两个人扶稳，这就是登山的独木天梯。我抢先把一条长绳子系在腰间，顺着竹杆第一个爬了上去。大约爬到几十米高处的悬崖上，有一个小土台，上面有一棵碗口粗的小松树，小松树上面有一个小斜坡，我决定把绳子拴在这棵松树上，以便后续部队拉着绳子登上去。于是我停住脚，把脚踩在草台上，腾出手解下腰间的绳子就往松树上拴。不料脚一用力整个土台与石崖突然分离，我一看不好，猛力往树上一扑，没有够着，忽悠一下子，连人带土一起掉了下去。幸好山下树多林密，我掉在一棵大树上，由上而下在树枝上翻滚几次。我心里明明白白，但心情紧张手上无力，怎么也抓不住树枝，终于摔到地面的乱石上。我的手脸全被树枝划破了，人事不醒，昏过去了。我被送到医院，经过抢救才苏醒过来。只觉得腰部剧疼，疼得我一身大汗。经诊断，我的腰骨摔坏了。

我身在医院，心在战场。我一个劲地埋怨自己，为什么偏在这个紧要的时候负伤呢？我没有完成任务，心里觉得惭愧。尔后黑包山战斗取得了伟大胜利，消灭了包括郝耀庭本人在内的匪军数千人，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粮食、马匹和其它军用物资。敌人准备过年的腊肉、香肠、糖果等年货都“慰劳”了红军战士，伤员得到了优待。我军全体指战员眉开眼笑地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

五、我印象中的陈政委

一九三三年我在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团部当打旗兵，不久又在团部交通队第三班当传令兵，专跟陈政委行动，因此和团政委陈锡联同志在一起生活战斗了近一年的时间。陈锡联同志那种

耿直爽朗、和蔼可亲、严肃活泼、机智勇敢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的陈锡联同志，只有二十来岁，中等身材，饱满红润的脸上，双眼炯炯有神。平时他爱说爱笑爱动，通常还未看到人影就听他在老远的地方，操着湖北口音边说边笑地向你走来，颇有青年的朝气。但在练兵打仗时，却表现得刚毅果断，沉着老练。他既是一位威望很高的指挥官，又是战士们情同手足的知心朋友。

他是“官”不象官。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他和我们同吃一锅饭，同穿一样衣，同战士一样穿草鞋，同战士一起睡在稻草上。按规定营长以上干部都有马骑，但他的马，不是驮病号就是驮东西，自己很少骑。他常和战士们闲聊天，做游戏，不仅有说有笑，甚至打打闹闹。这在今天看来好象是不可理解的，但那时却是极平常的事，指战员除少数年令较大外，几乎全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甚至还有十几岁的娃娃。黑暗的旧社会，促使他们变得早熟，反动派的压迫剥削，把他们“逼上了梁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大家聚在一起，不论职务高低，都是阶级弟兄，亲如手足，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外来人根本分不出哪个是干部，哪个是战士。

当时我们跟他行动的共有十四、五个传令兵，陈锡联同志很少称呼我们的名字，而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叫我们的浑名。一个比较漂亮、行动斯文、一说话先脸红的青年小李子，有一次闹着玩行动慢了一点，班长开玩笑地说：“你怎么忸忸怩怩的，象个‘婆娘’似的。”引得大家一阵哄笑，以后同志们便都叫他“婆娘”了。小李子对这个称呼非常不好意思，可是叫长了也就习惯了。有一天陈政委听到大家叫小李子“婆娘”，很奇怪，便问是怎么回事，同志们把小李子浑名的由来告诉给他，他听了哈哈大笑：“噢，是这么回事呀，好，好！”以后他见了小李子，也喊“婆娘”了。有一个战士短粗胖，耳朵又大又尖，陈政委就管他叫“兔子”，还有一个是黄陂县人，便叫他“黄陂佬”。我年轻时有些胖，于是就叫我“胖子”，或叫我是“打旗的”。我们对这些称呼，当时谁也不认为是污辱人，相反，倒觉得很亲近、温暖、亲切。